

第一编 东方哲学

第一章 现代中国哲学

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改组的时代。一方面，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志士仁人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反对封建意识形态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间，中国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哲学的变革是整个社会、政治局面变动的一部分。要阐述现代中国哲学，便不能不顾及到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

许多知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大变动、哲学思潮的勃兴较之先秦时期的社会变动及其出现的百家争鸣局势，意义更为深远。其原因有二：第一，帝国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地位。西方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打破了封建文化的格局，许多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哲学家，融合中西哲学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主流，从而使现代中国哲学以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和中西交融，超越了中国以往的任何历史时代。因此，积极拓展对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拟把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划分为二个大的时期，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从1949年以后为第

二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节 现代中国哲学的诞生、发展线索

中国哲学向现代化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在近代，中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始终处于受侵略、压迫、屈辱的地位。“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亟待解决的最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也是亟须解答的社会理论问题，它向中国哲学界提出了探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这一要求内含着中国哲学自身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即要求哲学方法、哲学理论内容及其理论形式等方面的根本变革和转变。贯串于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上述要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体现。从1919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30年里，中国哲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行化，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纪元；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输入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等民主主义哲学体系。我们仅就中国哲学在现代前期的分化、发展及其理论贡献简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1915年燃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到“五四”运动前后达到了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受过传统思想熏陶、又接受西学洗礼的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腐朽性和西方文化的软弱性均有某种程度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又为重新评估这两种文化提供了新的批判武器。李大钊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作为“第三种文明”发展起来的

俄罗斯之文明足以发扬东西文化长处的媒介^①。瞿秋白也认为 东方与西方这两种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唯有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②。

从内容上看，最先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李大钊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另一名早期传播者李达，也在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成就。早在日本学习期间（1918—1919），他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热烈宣传社会主义。李达所写的《现代社会学》（1926）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已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单纯理论介绍，而是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也往往杂采了一些其它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李大钊的思想中就时有闪现。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以后，系统地讲授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进入全面传播的新时期。瞿秋白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等论著，概括地说，瞿秋白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述有如下一些基本内容：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我’是与外界‘非我’相对待的，……‘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③

第二，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物质观。他说：“全宇宙只是统

参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560页。

② 瞿秋白《赤都心史》。

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第2页。

一的物质之种种组合或混合的方式。”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①

第三，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说：“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就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初输入和介绍的主要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尔后则转入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介绍和研究。为了答复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责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艾思奇等人都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翻译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1934年至1935年，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哲学讲话》，以后又出版了社会影响极大的《大众哲学》，用活泼生动的语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伴随着中西体用之争，而且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界内部，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接受也有一个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如果说，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主要是以理论家的身分，至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及其出路，那么，毛泽东却主要具有“实践家”的品格。正是这种实践家的品格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途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身上获得了个性化的发展，最终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态在中国发挥作用。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形式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当时党内王明等人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把

①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第51页。

② 瞿秋白：《社会科学讲义》第3集，第48页、第49页、第65页、第50页。

“调查研究”引入认识论，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实际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的许多哲学著作从其论述形式上看，是从普遍到特殊，而其思考和论述的重点却是特殊，对事物殊相的研究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色。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虽然从战争一般及其规律的客观性的论述开始，但其重点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把战争的特殊性提到首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大特色，是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中，突出强调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和列宁相比，毛泽东更突出主体对客体认识和改造的能动性，而且他强调直接经验、强调“知行统一”，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①。他把知行统一的认识论称之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提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②“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③毛泽东还突出地强调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大意义，就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④。

二、其它哲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对哲学的贡献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已同世界各国哲学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摆在中国哲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问题。现代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的输入，中西之学的差异和冲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65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9页。

③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73页。

突，成为中国哲学变革的重要契机和因素。在这期间，中国现代哲学出现了两种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二是西方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后一部分哲学家融通中西，各自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从政治倾向上看，他们属于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论著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都程度不等地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因此，在考察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理应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出合理的评价。

把西方哲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哲学，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者，最著名的应是冯友兰先生。冯友兰是《新理学》的提倡者。他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过去20年中，我的同事和我，致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些。”^①冯友兰认为自己的《新理学》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所谓接着讲，就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他当时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是适用于形而上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所谓‘逻辑底’意思是说‘形式底’。”“所谓‘形式底’意思是说‘没有内容底’是‘空底’。”所以他在《新理学》中对“真际”与“实际”、“共相”与“殊相”范畴进行了纯逻辑的、纯形式的分析。在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系统中，有四个主要的概念，就是理、气、道体和大全。冯友兰认为，所有这些概念都只是“逻辑观念”，因为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而不是对实际有所肯定。处于真际中的逻辑概念是超时空的、永恒不变的。例如，“理”是事物所以为事物的依据，总所有的“理”就构成“理世界”，它在逻辑上（不是在事实上或时间上）先于实际的世界。同样，“气”也是一个逻辑观念，它并不是指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被抽去物质性的可

^①《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

能的存在。“道体”是理和气统一的“程序”；“大全”就是“一切底有的别名”，也就是宇宙，但不是物质性的宇宙，而是哲学上的“太一”，它也是形式的、空的。冯友兰就是这样建立起一个纯逻辑的哲学体系。

冯友兰在1981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说：“理和事，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的思维对它们加以分析，才显出它们的分别和对立。这是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就认识说，本来没有谁先谁后，谁上谁下的问题，其所以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把关于认识的问题与关于存在的问题混淆了。”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冯友兰对自己哲学活动的总结。尽管如此，冯友兰关于哲学与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观点，关于伦理学的“四境界”说，仍是很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其历史意义仍然存在。

熊十力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在半个世纪的哲学活动中，他融合中、印、西哲学，铸成一家之言。1932年他的代表作《新唯识论》问世。他的哲学体系是亦佛亦儒又非佛非儒。他是在领悟人生的立场上来阐发本体论，并以“体用不二”为宗旨，把本体论、人生论、认识论熔为一炉。他继承易学关于过程与整体一致的思想。他说：“我国的易学家也都把宇宙看做是一个动荡不已的进程。这种看法是很精审的。”又说：“我们须于万变不穷之中，寻出他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就是相反相成的一大法则。因为说到变化，就是有对的，是很生动的，有内在矛盾的，以及于矛盾中成其发展的缘故。”^①他对相反相成的解释是：“独阳不变，孤阴不化，变必有对，是常理也。……宇宙开辟，必率由乎相反相成之根本法则。此无可疑也。”^②

以人事为本、以心性为本体的本体论，使他的认识论具有独特

^①《新唯识论》语体本，卷上，第69页、第56页。

^②《坤衍》第二分，第33页。

的性质。他说：“如果偏说理在物，是心的方面本无所谓理，全由物投射得来，是心纯为被动的、纯为机械的，如何能裁制万物，得其符则？”^①他认为，事物具有种种形式和法则，这是范畴的客观依据。但没有能所的交互作用，认识也不能发生，故不可舍心而言理。他在这些论述中，表述了自己关于心与境、意与物、能与所的“两端而一致”的关系。他把主客体统一的基点实际上是放在主观意识一边，用主观去统摄客观。

金岳霖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很早就认为，中国的哲学缺少发达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同西方哲学概念相比，意义歧混，观念彼此联结，给人一种不确定感。所以，运用西方逻辑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这就构成了他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特色。他在《论道》和《知识论》等著作中，使人感受到逻辑分析方法的威力。他通过长期的艰苦探索，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了自己的认识论体系。在《知识论》中，他提出了“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命题。他认为：“对象底性质不是官觉者所创造的”。相对于所与，概念具有“摹状和规律（也叫形容和范畴）双重作用。所谓摹状，是把所与的呈现，符号化地安排在意念图案之中，规律是运用意念的图案去接受新的所与。“所谓知识，就是以抽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他认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的性质，是“摹状和规律底基本原则”。坚持和宣传近、现代逻辑学，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除了我们在上面谈到的以外，较有影响的哲学家还有张东荪、梁漱溟、贺麟等人，他们也都有其哲学理论，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就不详述了。

综上所述，在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在内容上的展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五四”运动至大革命失败以前，对

^①《新唯识论》语体本，卷上，第 21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应用集中在唯物史观方面；从大革命失败以后至3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的理论兴趣逐步转向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哲学认识论问题日益突出出来。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是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及其革命的特殊需要展开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不是表现为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观察国家命运、指导革命斗争的工具，而形成一种为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的思想路线。与这一主流倾向有所不同，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哲学活动侧重于对中国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在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目的在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改造国民的思维方式贡献力量。他们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最初尝试。

第二节 近40年来中国哲学的曲折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法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部分。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无论从国内外环境还是从哲学研究的状况来看，这两个时期均有很大的不同。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哲学的发展概况

毛泽东用马列主义哲学观点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艰难环境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赢得了声誉。所以全国解放不久，就掀起了一个大规模地宣传、阐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国内大量翻译出版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其中包括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也被大量地翻译、输入。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不久，又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以及梁漱溟哲学思想等一系列的批判运动。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毛泽东在这篇哲学著作中简明扼要地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新提出的新问题，即关于如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包括列宁在内都未能提出来，更谈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完全适应的。所以，毛泽东的著作一问世，立即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的原则和措施。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庸置疑，书中有些观点并非无懈可击，有些问题是可以重新讨论的，如认为民主只是手段的看法。此外，毛泽东

在同一时期的讲话中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显然又偏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基本思想，⁷⁹导致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进行错误的估计。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毛泽东本人不谨慎了，过分地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正确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建成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性，以致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这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论根源。与此相应，哲学界的学术讨论主要是限于怎样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这一时期，哲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进展。就外国哲学而言，哲学工作者首先进行了翻译和整理外国哲学的资料工作，哲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哲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如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与此同时，哲学界初步开展了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和批判，陈元晖、江天骥、贺麟、汝信、张世英等人都发表了一些有关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论文和论著，为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这一时期逻辑学的研究也比较活跃，逻辑学界从1955年开始讨论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国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势头。关于美学、伦理学、形式逻辑和哲学各个领域的争论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惜在国内政治、

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出现了骄傲情绪，不谨慎了，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著名的学者被错划成右派。紧接着是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把不同的学术意见当作敌我矛盾处理。

通观这一时期的哲学学术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较大。一是建国初期，我国哲学界曾就日丹诺夫提出的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等问题召开过讨论会，无保留地接受并遵循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概括，这种简单化倾向对整个哲学学科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二是为了尽快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体系，各分支学科均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界的有关论著。了解这些论著无疑是有益的。但由于当时苏联思想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也在国内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普遍存在的下述倾向：只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而不讲统一；凡政治上进步的，其哲学必唯物，凡政治上反动的，其哲学必唯心；不加分析地认为社会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一概地排斥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等等，实际上都与苏联哲学界的错误理论观点有关。

这一时期哲学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先秦哲学、封建社会后期哲学、近代哲学。发表和出版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任继愈明确地提出了日丹诺夫对哲学史下的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冯友兰提出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直接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哲学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

50年代中期掀起的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和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是由《人民日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篇旗帜鲜明、观点各异的文章而触发的。美的本质问题属于美学的哲学基础范围，这一问题涉及主客体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美的本质问

题虽然直接属于美学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到主客体关系和实践问题，对认识论的研究也是很有教益的。在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几种观点最终导致了我国美学界的不同派别的形成。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学术研究停止，学术刊物停办，哲学工作者被下放劳动。哲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编辑“语录”、阐释“经典”。哲学研究就是解释经典著作。二是直接为政治运动寻找解释。时而大讲天才、狂热鼓吹个人崇拜，时而批判“天才论”忽而批判《水浒》的投降主义忽而批判老干部的“经验主义”完全随政治需要为转移。三是把学哲学当作“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导致哲学的极端庸俗化。

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命运是始终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某种哲学理论的正确与否，会对社会发生重大作用。实际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的失误根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理论的误解。尽管他正确地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是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的指导下提出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里要不断革命、革命不能“断气”；只有经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毛泽东越来越强调后者对前者所谓“反作用”，实际认为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和经济建设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照他看来，生产力的问题要靠生产关系的革命去解决，而生产关系的问题又要靠政治的、思想的斗争去完成。毛泽东认为，进行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它作为一种斗争“模式”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哲学界在较长时期以来，把各时期的哲学思想一概归结为“两军对垒”这正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模式

在学术领域的运用和表现。正如有人指出的，这种融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权力意志论于一身的“斗争哲学”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近 10 年来哲学研究的恢复和繁荣

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1978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继之而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初，两报一刊^①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与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的结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哲学界的有识之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撰文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的实质是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经实践检验为错误的重大决策。“凡是”派主张继续干下去。而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吃够了苦头，拥护拨乱反正。实践检验出不是真理的要坚决改正。这场讨论为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着眼点，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这一时期哲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历史哲学和认识论。批判了数年来流行的“生产关系革命决定论”，澄清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革命”概念上所造成的混乱。

随后哲学界研究和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心理、习惯力量、生活方式、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创造问题以及关于社会学与历

^①当时的习语，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了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起初是对经济领域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哲学思考，探讨了中国现阶段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性质及其客观依据，随后又转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论题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人们的观念、作风等改革与社会心理诸方面的问题。

随着系统论、信息论等现代方法理论的引入，近年认识领域的研讨较为活跃。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范畴都是包含诸种要素的概念系统，范畴的本质就表现在构成它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之中。要阐明实践范畴的本质特征，就必然要涉及主体、客体、目的（价值）、手段、结果诸概念。由对实践的平面式笼统论述转入对实践范畴的结构分析，标志着认识论领域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学术界不仅探讨了构成实践过程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践活动的类型、而且讨论了评价实践成败的标准。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包括对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那么，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实践的成功或失败呢？王若水、夏甄陶等人认为，实践活动是有预期目的的，是为了实现目的的，无目的的行动是无所谓成功或失败的。目的不同，对同一实践的结果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目的就是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通过自身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而关于衡量实践成败的问题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价值问题。价值范畴是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它的提出和讨论是认识论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之一。从认识方面研究价值范畴问题始于1980年。《学术月刊》在1980年第10期发表了杜汝楫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提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所谓事实与价值之分。随后，许多报刊陆续发表了探讨价值论与价值观念方面的文章，对于价值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价值论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科学意义、价值概念的哲学涵义和本质、价值的客观性、评价性认识的特点以及价值与真理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主

义时期价值观念的变革诸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论。

近年来,由于主体性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一种观点认为,“反映”概念仅仅揭示了认识内容的客观性,而忽视了认识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它局限于在宏观水平上评价认识的结果,不能揭示认识发生发展的内部机制;“反映”概念的中心点是强调认识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存在的外部世界,这就是说,这种认识对象是既定的、给予的,这一点显然与现代对客观实在的理解不相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映范畴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他们所创立的能动的反映论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显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没能解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是不公平的。但必须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和列宁的思想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哲学体系也是有区别的。当代的哲学的实际情况是令人遗憾的。近一个世纪以来,认识论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反映论上。笔者认为,客体至上、知识本位、忽视主体作用是现行哲学体系的弊端,这一点也表现在认识论方面。笔者对“反映”概念的责难,并非要彻底取消它,而是针对以往对待“反映”概念的形而上学态度。在有些人看来,无论何种认识论问题,只要把它归结为反映,似乎就完事大吉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反映概念这个武器去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但结果如何呢?倒是那些所谓的唯心主义流派发展了认识论的某些方面,而我们却仍然是躺在“反映论”上睡大觉。任何范畴,不管它多么重要,其职能总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超等范畴、当作解决一切认识问题的灵丹妙药。“反映”概念坚持了认识论内容的客观性、坚持了认识结果与对象的相关性,但它不能说明认识过程的复杂性。

近年来,哲学史各学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翻译、收集、整理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

具体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标志等课题，都提出了一些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见解。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毛泽东的青年时期的著作，他的活动和世界观的转变、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从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论文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正向纵深发展，其表现是在通史研究的基础上正逐步转向对专史的研究，在断代史的研究上，也出现了把早期发展史和其他时期发展情况联系、统一起来的努力。此外，对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的研究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侯外庐、邱汉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学史》等书相继问世。1981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分别就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范畴问题，组织了讨论会和座谈会。此后，汤一介、张岱年等发表专文，论述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论文，并与西方的和印度的哲学范畴进行了比较研究。过去长时期被忽视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较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长期以来，中国对其它东方国家哲学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近几年来，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特别是对日本哲学史的研究比较活跃，对印度哲学史、朝鲜哲学史的研究和资料翻译工作也在着手进行，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哲学史的理论研究始终伴随着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诸如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以及哲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关系到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向。经过近年来的讨论，有些意见逐渐趋于一致。

近年中国哲学界围绕着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数意见认为，把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一概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此外，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还就唯心主义的评价、哲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